

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的探索

毕学进¹，马金华²

1.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财政史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学科话语权是学科生产力、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的统一体，是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一般问题解释的软权利。文章以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代国人对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的探索历程。研究发现：近代中国大批财政学论著先后问世，学科生产力明显提升，但大部分论著的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却相对有限。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尝试突破这一局限，该著基于中国儒家的经典学说，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术语表达，综合利用归纳法、演绎法与历史分析法等方法论，从生产、分配等现代财政学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的起源与进化，分析了政府活动的一般通则，并指出了人类一般行为准则。该著从人类、国家、个体三个层次构建了适用于人类文明一般规律理论体系，引起了凯恩斯等人的关注，部分内容甚至并被美国所借鉴，具有较强的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这表明中国智慧完全有可能凝成世界一般规律的学说，启示未来中国财政学科研究需深入挖掘本土智慧，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与学术融合，构建一个既能解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的财政治理实践，又能涵盖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财政理论体系，以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提升中国财政学话语权。

关键词：话语权；《孔门理财学》；儒家；财政学

中图分类号：F812.9

一、引言

学科话语权^①不仅是某一学术领域内知识体系与理论架构的生产力、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的统一体，还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话语和政治话语明显提升，但是学术话语权依然还处于“失语”状态。尤其是在财政学领域，尚缺乏引起国际关注的代表性成果。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有鉴于此，既往学界对当代中国财政学科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如形成了财政风险论（刘尚希，等，2018；陈龙，2020）、国家治理理论（高培勇，2014；刘晓路和郭庆旺，2017；吕冰洋，2018）、新市场财政学（马海涛和陈珊珊，2017；李俊生和姚东旻，2018）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些研究尝试从不同理论角度解释当代

收稿日期：2023-08-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研究”（20AJY018）；中央财经大学标志性科研成果培育项目“从家国同构到国家共治：中国财税历史透视”；中央财经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特色领域“中外财经史”

作者简介：毕学进（1989-），男，安徽安庆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马金华（1976-），女，山东莱芜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

^①话语权是在特定学科领域内，某一群体拥有对该学科核心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定义、解释和评价的广泛性认可的权利。王国刚和罗煜（2023）认为，话语权是指说话的权利和话语的影响力（参见：王国刚和罗煜：《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三大体系”之点论》，《中国经济学》2023年第2辑）。从这个角度而言，话语权是一种基于知识的“能说得上话的资格”，这并不意味着话语权持有者具有压制他人的权力，而是一种基于专业知识和学术影响力构建的权威性，使其能够在人类一般性问题上能够发表观点并获得广泛的认可。

中国财政何能“何能为治”以及“何以为智”的问题。然而略显遗憾的是，较少有学者关注到中国财政学科的话语权构建问题。不仅导致国家治理可能依附于西方主流财政学理论之下，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也就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有效表达中国立场和中国观点。

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的探索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财政知识不断渗入中国后，财政学论著开始密集出现，改变了既往中国在“讳言利”语境下财政学研究的碎片化现状，财政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得以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指导了国内的财政改革与实践。但是从国际视角而言，近代中国财政学科的创新力、传播力与应用力相对有限，除《孔门理财学》^①等极少数论著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并在得以国际化运用外，代表性的成果较少。所以尽管近代中国财政学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但因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的存在，在国际财政学界乃至经济学界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反观当下，虽然在大量引入西方财政学之后，中国财政学的学科体系与现代财政学科体系较为接近，但由于缺乏像《孔门理财学》那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代表作，使中国财政学话语权依然不足，声音不够。有鉴于此，本文另辟视角，从理论上解构学科话语权的表现形态与生成逻辑，并从以近代中国在国际上引起较大传播力与应用力的《孔门理财学》为中心，阐释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探索的基本历程与路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当代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存在的问题，以期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的构建提供可供借鉴的启示。

本文的边际性贡献主要有三：（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选取了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这一既往学界很少引起关注的问题展开了分析。尽管既往学界就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多数是借鉴西方学理解释当代中国的制度创新现象，对具有中国底气的财政学话语权的构建缺乏专门性探讨。（2）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明确阐述了财政学话语权取得的表现形态与可行路径，尤其是本文通过《孔门理财学》的案例阐述，为中国本土智慧的挖掘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②也证明了当代中国财政学要想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在吸纳全球知识的同时，也应重视对自身智慧的凝练。（3）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历史研究与古今与中西对比研究法，通过近代的探索历程分析，阐述了历史探索的“得”与“失”，并为当前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的经验与启示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①第一，从《孔门理财学》的内容来看，该著将“理财”定义为社会不同阶段的公共权力组织和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而将“财政”定义为政府的收支活动，所以该著将“财政”内容归入到了“理财学”的一部分。而古代中国的财政活动主要围绕“理财”而展开，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等内容。贾康（2019）认为，财政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以社会性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广义生产关系链条中的部分（参见贾康：《财政学通论（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第72页），而该著也是从生产、分配等现代学理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的起源与进化，分析了政府活动的一般通则，并指出了人类一般行为准则。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孔门理财学》中的“理财”内容，可认定为财政学的基本范畴。第二，孔门理财学虽然是国外首先出版，但是他一方面是国人编著，另一方面其描述的内容是中国的文化和智慧，是一种尝试将中国传统理财思想现代化的探索。正因如此，凯恩斯、布洛克等人才通过此书，观察到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超前的智慧，因而《孔门理财学》是国人尝试将自己的思想纳入到全球主流学术轨道的尝试，可被认定为是中国财政学的代表性著作。

^②既往学界提出了一种可行性的路径，即中国特色的财政学构建，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挖掘。如马海涛等（2023）提出中国古代理财智慧是中国财政理论创新的“根”（马海涛、毕学进和马金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的元素构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年第2期）。马金华等（2023）认为，中国特色财政理论要对本土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参见马金华、毕学进：《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基于古今中外财政智慧的创造性转化》，《财政研究》2023年第3期）。高培勇（2014）认为，要在“接地气”中重视中华民族的思维传统实现中国特色财政理论创新（参见高培勇：《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创新——由“基础和支柱说”说起》，《管理世界》2015年第12期）。这些研究倾向于挖掘本土知识资本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框架，但尚未提供充分的经验证据。

二、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探索的表现形态

（一）学科话语权的表现形态与生成逻辑

学术话语权的确立，往往涉及对特定符号、术语和人类一般问题解释权的掌控，是软实力认同的象征和媒介。赵春丽（2020）指出，学科话语权是利用相关学科理论解释人类一般问题的权利与资格。韦路和秦林瑜（2023）认为，学科话语权是在特定学科领域内，某一学者、学派或机构对知识解释和阐述的权利资格。

学科话语权有哪些表现形态？**一是学科的生产力**。韦路和秦林瑜（2023）认为，国际学术话语权离不开相关学科的学术生产力。所谓学科的生产力，是指学科主体开展学科研究的能力，直接表现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论文、专著等学术成果的生产。**二是学科的创新力**。学科创新力可理解为基于实践或其他途径的知识创造或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拓展和深化，是一种在学术社群中普遍承认的原创性知识的生成能力。**三是学科的传播力**。赵蓉英等（2022）认为，学科的传播力是学术评价必不可少的维度。学科传播力其核心在于知识与理论的系统传播和普及，通过合适的渠道与方式，达到知识有效的传递与扩散。学科传播力并非仅仅局限于学术界，而是触及到了政府、社会和公众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当前一些西方意识形态下生成的理论，如“蝴蝶效应”“墨菲定律”“木桶理论”“羊群效应”早已突破学术圈层，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理论，展现出西方学术理论的传播力和穿透力。**四是学科的应用力**。姜敏和郝煜洋（2022）认为，学科话语权持有的表现之一是学科的应用力。应用力并不是简单的知识迁移或技术实现，而是在严谨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实现学科知识在现实社会中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创造性转化，进而生成了对人类一般规律、政府一般通则和个体行为一般准则的解释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表现形态与话语权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拥有强大的学科生产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应用力能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话语权；另一方面，持有话语权的学科或学者更容易获得资源和机会，从而在学科生产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应用力等方面表现出色。因此，这些表现形态既是话语权的結果，也是其持续发展和强化的动力。

学科话语权何以生成？**一是本土智慧的理论表达**。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马克思，1979）。学科话语权的确立与培育，不可割离于其所蕴涵的民族智慧的沉淀和积累。西方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创造并非孤立产生，而是在经济生产和社会运作的特定背景下逐渐孕育、总结和演化。它们反映了特定民族在特定时空下的价值选择，进而由特殊到普遍，以揭示人类的一般性特征。**二是全球理论的理性借鉴**。学科话语的构建非单一文化或学派所能囊括，须依赖于全球理论的对话与借鉴。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全球理论的理性借鉴不仅促进了不同理论观点的相互理解和沟通，还促使学科话语在反映本地文化特色的同时，与全球智识共同体达到共鸣，进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使民族性更符合世界性的要求。**三是学科研究的方法工具**。学科话语的构建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引导和塑造。方法论作为科学研究的基底，是学科研究操作指引的工具，也是确保研究结果可靠性与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二）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探索的表现形态

1. 学科生产力

晚清时期中国引入西方的财政思想后，一些财经论著先后问世，其中有关于财政学的内容主要有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郑观应《盛世危言》等著考察了西方财政制度。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一大批财政学论著先后出版，呈现出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等特征。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 1 1911-1949 中国财政学论著出版情况（单位：本）

年份 学科分类	总出版数目	分阶段数目			
		1911-1919 年	1921-1929 年	1931-1939 年	1941-1949 年
财政基础理论类	293	26	40	139	88
其中：中国财政	152	10	20	73	49
自治财政类	37	4	1	10	22
租税类	471	16	47	196	212
预决算类	22	3	-	12	7
财政监督与管理类	127	4	9	42	72
战时财政类	37	-	-	28	9
公债类	92	4	20	48	20
市县财政类	11	-	2	5	4
总计	1090	57	119	480	434

数据来源：根据敖涛、付志宇《近代中国财政思想转型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6-64 页数据整理。

通过表 1 的数据可发现，从 1911 年至 1949 年，各时期的财政学论著出版量分别为 57 本（1911-1919 年）、119 本（1921-1929 年）、480 本（1931-1939 年）和 434 本（1941-1949 年），整体出版总量呈上升趋势。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租税类的出版数量最多，达到 471 本，约占 43%。其次是财政基础理论类，达 293 本，大约占 27%，其中有一半在关注中国财政问题，达 152 本。另外财政监督与管理等问题也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达 127 本，约占 10%。

以上仅为出版物，另外一些期刊类文章也逐步增多。仅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财政命名的期刊即有 43 种，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公报形式的，主要用于发布政府的法规和命令；第二类是评论和学术刊物，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政策讨论上；第三类则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刊物，专注于地方财政法令和状况的研究。另外，《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新经济》《银行周报》等刊物也大量刊载财政学论文。仅以近代中国财政学典型刊物《财政评论》为例，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统计发现，《财政评论》累计刊文 6087 篇，自 1939 年创办起，其历年刊文数分别为 528 篇、657 篇、671 篇、512 篇、660 篇、677 篇、765 篇、924 篇、693 篇、刊文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以上仅为国内出版的财政学论著，实际上这一时期还有海外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及其相关论著。如陈焕章于 1911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陈兆琨于 1914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马寅初于 1914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许传音于 1917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论文《英国铁路费率的国会管制》、龙开霖于 1924 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美国农业部的财政历史》等。从研究内容来看，其中有不少论著是用西方学理阐述中国传统智慧的，如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也有用西方理论框架考察西方问题的，如许传音的《美国农业部的财政历史》，因而这一特殊群体与国内学者不能说完全隔离，但也不能简单合并在一起讨论学术样貌和生态。

如果横向比较，近代中国财政学只是在“量”上有所提升，但是国际影响的论文、专著等学术成果的生产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出版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等一系列国际影响的论著，展开了大

量关于税收、公共支出和预算制度的理论讨论，多个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不断完善。此外，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还建立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为财政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资源，相比于国内，长期的战争以及动乱不仅消耗了国家资源，也影响了财政学的知识生产。

2. 学科创新力

近代中国财政学论著的出版较为丰富，其中不乏一些创新性的探索。如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的公共支出、税收、公债和财务行政进行详细分析，是倡导西方财政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探索，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提供了有力支撑。^①贾士毅的《民国财政史》以制度和历史变革为研究轴心，全面剖析了民国时期的财政体制。该书不仅依赖第一手档案和详实的统计数据，还融合了财政理论与实践，同时该著作采用“当代”财政史的研究视角，具有及时总结历史经验的价值，在民国财政史研究中具有创新性和先导性。^②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强调财政学必须考虑本土历史和社会环境。通过对凯恩斯的《通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马寅初认为凯恩斯理论是基于极端资本主义和高度工业化的英美环境，不适用于中国。^③除此之外，还有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尹文敬的《战时财政论》等都尝试利用西方财政学理分析中国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探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近代中国财政学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探索，但其成果多为对本土制度的描述性分析或对西方理论的直接引介，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而被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或重视的论著并不多。

但是，其中有一本著作，即陈焕章在191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影响。该著按通论、消费、生产、财政与结论五篇，系统用西方经济学思维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孔门理财学》的写作目的，即希冀在西人鄙夷中国学术的背景下，形成国人自己的财政学专著，以昌明孔教，提升中国文明在国际上的话语。^④从《孔门理财学》出版后的影响来看，该著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力，该著出版后，夏德（Hirth F）、施格（Seager H）、布洛克（Bullock T L）、罗斯（Ross E A）、凯恩斯（Keynes J M）、韦伯（Weber M）、熊彼特（Schumpeter J A）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该书引起了极大兴趣，指出该著从另一个新颖的视角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改变了西人“中国无智慧无学术”的观念，一度扭转了西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态度与视野。一些影响世界的理论著作也引用了该篇文献，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熊彼特，1991），韦伯在其《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韦伯，2018）等著中即大量征引了《孔门理财学》的内容。

3. 学科传播力

从国内传播而言，近代中国有不少论著被广泛传播与引用。如由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一书，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财政学研究水平的代表作之一，为全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科系广泛采用，成为当时畅销的教材之一，在两三年间就畅销了九版（胡寄窗，1984）。再如，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由出版的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在十年内共印行七版，直至1930年代中期，该书仍是多数中国财政学著作的主要参考，其体例成为民国财政学研究的典范（邹进文，2008）。尽管中国的财政学著作在国内具有广泛的传播影响，但这些作品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和认可度相对有限。而近代国际上流传的国人财政学作品，主要来自留学英美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受到西方学术体系的培养和熏陶，因而更容易将其研究成果纳入

①何廉、李锐：《财政学》，上海：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

②参见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

③参见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④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萃报》1912年第1期，第78-84页。

国际学术交流的主流渠道，但是遗憾的是，这些论著有不少是研究西方问题，如龙开霖 1924 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美国农业部的财政历史》、刘炳业 1924 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资本税（1919-1923）》等即是以西方学理研究西方问题。中国本土出版的多数财政学论著，未能在国际上广泛流播。

但陈焕章在 1911 年出版的《孔门理财学》在国际上广泛传播。据 Wang (2022) 的统计，近 100 年以来《孔门理财学》已再版近 30 次，平均不到 4 年即会再版 1 次，美国戈登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英国托玛斯出版社等国外知名出版机构以精装、软精装、平装等多种形式多次重印了该书，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播。《孔门理财学》已成为广泛征引的重要学术文献，凯恩斯（1912）阅读《孔门理财学》后，指出陈焕章博士充满学问且令人愉悦的著作中有大量内容会让人们愿意引用。^①西方报刊对《孔门理财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太阳报》（“The sun”）认为“陈博士却从中提取了孔子的经济思想，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这是一项从未有人用任何语言做过的工作。”^②《美国历史评论报》亦持同类观点，“则其发明本国法制于本国之人，以致重大之实用于再造国家。而为特辟纪元之著作”。^③《独立报》（“Independent”）认为中国儒家的理财原则或可有益于世界，“陈焕章阐明了中国儒家的道德及其与理财之关系，精深透辟，将必有益于世界。”^④《东方评论报》也指出，“有莫大之价值于西方世界者，当其未出世之日，西方之智识，于所谓实在之道，为华人品格之根本者，不过其最浮泛而琐碎者耳。是书之题目，虽含义甚广，而作者独自显其能，使凡西方之通儒及学生，与夫普通之读者，皆能明了，此诚华人未有之著作也。其永垂不朽，真可作为纪功碑矣。”^⑤

4. 学科应用力

近代中国的财政学指导了本土财政改革。近代中国的财政学论著大量借鉴了西方的财政学理论，并在本土的财政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近代中国本土出版的公债论、战时财政论、预算论等指导了中国的财政改革实践。如董修甲的《市财政学纲要》，为市财政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治安、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性参考。^⑥尹文敏的《战时财政论》，详细探讨了战时公债的纸币、公债和租税等政策的组合运用，尤其提出战时财政应多征财产税、所得税和战时利润税，为战时经费的筹措提供了参考。^⑦朱博能的《地方财政学》和《县财政问题》，在解析地方与国家财政关系、财权划分以及地方财政的多维特性方面具有一定的探索。这两部作品不仅深入探讨了地方财政的理论基础，如其与国家财政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还从经济、行政和制度等多角度进行了全面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在地方财政范围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地方与国家财权的均衡发展方面提供了独到见解。^⑧《县财政问题》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视野，详细探究了县乡镇财政问题，^⑨其详尽讨论不仅对当时的县级财政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当时的地方财政制度提供了理论参考。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财政学著作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相较于西方财政学的全球影响力，这些著作尚未形成具有普遍适用性应用的理论框架，其影响主要局限于国内范畴。究其原因，是近代西方财政学论著多数是对西方理论的直接搬移，缺乏对西方

①参见 Keynes J M. Book Review of H.C. Chen ‘The Economic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Economic Journal*,1912,22(88):584 - 588.

②A Chinese in China, The sun. 1912-1-26.

③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年，第 422 页。

④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年，第 421-422 页。

⑤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年，第 422 页。

⑥参见董修甲：《市财政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

⑦参见尹文敏：《战时财政论》，重庆：中央政治学校 1940 年印刷。

⑧参见朱博能：《地方财政学》，重庆：正中书局，1942 年版。

⑨参见朱博能：《县财政问题》，重庆：正中书局，1943 年版。

经典理论的实践回应，也未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西方的财政学理论，导致中国财政学全球应用力十分有限。

然而，《孔门理财学》中描述的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却在全球大萧条期间得以在美国移植，并向全球推广。布洛克指出“常平仓”挑战了西方长期盛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儒家似乎对自由放任主义有不同的意见……很明显，无论如何，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在所有这类措施中，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均衡谷物价格’。”^①常平仓还引起了曾任美国农业部长、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的关注，面对美国的农业萧条，华莱士指出，“一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称为常平仓。它一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华莱士设想将常平仓系统引入至棉花中试点，具体方案是“在棉花价格下跌时买入，在棉花价格上涨时卖出”，^②这即为中国古代的平糶法与市易法的应用。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参议院部分议员的信中指出，当前美国受到了不稳定的诅咒。“如果能够实施常平仓计划，储存大丰收年份的剩余粮食，以备歉收时使用，那么这个项目不仅对农民，而且对国家的消费者都有巨大的价值。”^③美国学界评论，“华莱士进入罗斯福内阁之前的至少10到15年里，常平仓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概念。早在1926年，他就创造了这个取自中国人的短语。……并逐渐成为他农业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素。”^④到1936年美国各州已经建立了13985处常平仓。^⑤美国报界探知，“截至1943年10月1日，（堪萨斯州）小麦库存比一年前的水平要少。……小麦库存保持在较高水平。”^⑥肯特郡农业经纪人在评论常平仓时说，“我们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给我们自己的人民，小麦、玉米、棉花和其他商品仓库，……这些都是常平仓效应的确凿证据。”^⑦因而报界评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在食物和燃料供应方面如此安全，”^⑧据此美国曾公开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将我们的努力引向一个国际常平仓计划。”1938年参加国际小麦大会的专家审议了美国提出国际常平仓计划，“人们认为它可能会考虑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常平仓，这可能意味着类似于美国新的作物控制法的世界推广。”^⑨1943年的国际粮食会议上，各国对常平仓制度的全球推广进行了进一步讨论，联合国成立后，“粮食和农业组织的计划要求建立一个世界常平仓，其职能是稳定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建立一个世界粮食储备，足以应对世界任何地区作物歉收所引起的任何紧急情况。”^⑩媒体展望“相信世界粮食问题正在得到解决。”^⑪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常平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成果，非近代创造而产生，但是正是由于《孔门理财学》用全球通行的学术语言，阐述了中国历史上面对天灾人祸的应对经验，让全球主流学术社群关注到中国智慧，并能向全球推广，说明挖掘本土智慧是中国财政学取得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①参见 Bullock T L. Review of books :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12, 107(27): 531-532.

②Wallace H A. The Ever Normal Granary. Wallaces' farmer, 1927-1-21-5.

③Special Letter Is Sent to Both Committee Heads Ask-ing "Sympathetic" Study. Evening star, 1937-7-13-B2.

④Davis J S. The economics of the ever-normal granary.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38, 20(1): 8-21.

⑤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mend 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as amended. 1937-5-28.

⑥Wheat stocks below last year's figure ,the people's voice. 1943-11-5-4.

⑦Ever-Normal Granary County Agent Wilson explains why we have plenty of grain, smyrna times. 1940-8-15-3.

⑧There shall be no hunger here, the midland journal., 1940-7-19-5.

⑨Wallace Outlines Planting Program for 1939 to Avoid Surplus., Evening star. 1938-7-15-3.

⑩Henry A. Wallace and the Ever-Normal Granar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6, 8(5): 411-426

⑪On the Other Hand, Offers Something More Pleasant To Look at Than Meat Situation, Evening star. 1946-10-17-5.

三、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的探索路径

（一）本土智慧的理论表达

全球性与民族性是共生的（谭伟平，2002）。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每个文化和社会都塑造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人类探索世界生成的智慧，对这些智慧进行挖掘，能丰富全球文明的多样性。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学科的全球化趋势要求超越地域和文化的局限，寻找普遍性和共通性。正是通过深入挖掘和理解每个文化和社会中的本土智慧，才能够发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和联系，从而推动学科的全球对话和合作。

近代中国财政学人认识到本土智慧挖掘的重要性，如李权时在《财政学原理》序言中提出要写成国人自己的财政学论著，并尝试将西方财政学的一些术语进行中国化，如他将 public income or revenue（“公共收入”）翻译成中国古语的“岁入”，将 public expenditure（“公共经费”）翻译成中国古语的“岁出”。^①南开大学提出自1927年要学科的“土货化”概念（即“本土化”），使用充分挖掘本土智慧的财政学教材，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即是在这一背景下著成。虽然一些学者充分认识到提炼本土智慧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尝试，但这些努力往往在理论范式的把控、术语的表达和方法论等多方面存在局限，难以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和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李权时在《财政学原理》自序反复阐释了自己写国货财政学的初衷与动机，但其著写成后，大量杂抄中外资料，依然没有走出对西方财政知识搬迁的藩篱，未能有效地对西方财政学理论进行深度的批判性分析和重构，也未能将中国特有的财政现实和文化因素融入到一个自己的理论框架中。然而，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突破了这一局限。该著基于中国儒家的经典学说，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术语表达，从生产、分配等现代财政学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的起源与进化，分析了政府活动的一般通则，并指出了人类一般行为准则。

首先，从本土智慧探寻人类社会起源及其进化。《孔门理财学》尝试从进化的视角，分析人类演化的阶段形态。人类从何而起是西方学者永恒探索的话题。《孔门理财学》指出，人类非起源于鬼神，而是“元气”。“元者，气之始也”（《尔雅·释诂》），何谓“元”？“始也，从一从兀。”（《说文解字·卷一》），何谓气？金、木、水、火、土为气运行的结果。人类出现后，血缘与地缘的聚居形成了人类社会，《孔门理财学》将社会的进化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②“据乱世”是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此阶段原始文明在混乱中萌芽，国与国之间差异明显。第二阶段是“升平世”，又称为“小康世”，此阶段人仁、义、礼、智、信逐步发展，政治状态由部落制转向君主制，国际法得以萌芽，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第三阶段为“太平世”，又称之为“大同世”，此阶段天下为公，人人平等，讲信修睦，国与国之间命运一体，人类品德达到最高水平。财政在人类进化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何以聚人曰财”。治国理政中，理财为“八政”之首，以保障国家功能运转，使民众食有菽粟，使人俱五伦五德，以升平世。进太平之世，无贫富之分、无阶级之别、无国度之域，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仁爱，人类进入理想社会。《孔门理财学》从理财与人的关系，阐释了社会进化论，从而解释了人类运行的一般规律。

其次，从本土智慧探寻政府活动通则。《孔门理财学》认为，盛行的西方自由放任主义学说在数千年前的中国即已有之，同时还论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政府干预主义，引起凯恩斯等人的关注。（1）**本土智慧与西方的自由放任主义**。《孔门理财学》认为，中国古人即已注意到了自由放任主义，如《礼记》有载，“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

^①李权时：《财政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9页、第297-298页。

^②《孔门理财学》将“三世”之说判定孔子学说，但实际为康有为在前儒基础上发展创造出了孔子的创“三世”之说。

原，而弗蔽也”（《礼记·礼运》），政府不得随意干预民众对生产地、生产活动的选择，要遵守自然法则，尊重依照资源禀赋而形成的劳动分工。“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倡以自然之道引导民众进行理财活动。《孔门理财学》指出司马迁的“善因论”系统总结了孔门的放任政策，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货殖列传序》），即儒家并不反对政府干预，但是“善者因之”，即对于符合市场竞争规则的行为，可以放任自由，只有对于有损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则需“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2）**本土智慧与西方的政府干预主义**。《孔门理财学》认为，即便西方经济学家鼓吹竞争需要绝对自由，但是在私欲的趋势下，个体永远不会获得满足，产能过剩等问题无法避免。同时，获得竞争优势的一方无可避免地产生垄断，导致“贫富兼并，虽皋陶制法，不能使强不凌弱。”（何休《宣公十五年解诂》），使他人的利益及公共利益无法保障。同时，自由竞争并不能排除恶性竞争，引发供给失调和恶性通货膨胀，需要政府调节。财富的分配以及社会保障也离不开政府干预。由此，《孔门理财学》总结了中国古代四条政府干预的措施，分别是政府购买（如平糶制、常平仓、均输平准制）、公共品提供（如《洪范》八政）、政府借贷（《周礼》泉府）与政府再分配（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与社会公平）。因而凯恩斯在读完《孔门理财学》之时，发出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似于现代经济学家的做法”的感叹。^①

（二）全球理论的理性借鉴

学术全球化背景下各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构建不再是封闭和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流动的（Storper & Dunning, 1999）。全球理论的借鉴允许学者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汲取不同学科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的智慧和经验，促进学科话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避免理论的单一化或同质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纳入全球学术轨道，形成了一种异域知识的对内流动和积累。“西学东渐”下，中外财政知识交流日益频繁，这不仅促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理论接引，也催生了中国本土财政制度的制度嫁接（毕学进，2021）。近代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财政学理论，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总是伴随着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本土对话。多数论著往往采取直接复刻西方的方式，忽视了西方理论的结构、逻辑和前提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估，也缺乏西方理论在本土历史与现实环境下的检验，使“西学东渐”变得表面化和机械化，难以形成具有独特见解和深刻洞见的代表性成果。

尽管如此，近代中国也出现了少量的对全球理论理性借鉴的成果，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即为其中之一。《孔门理财学》一方面采取西方学术书写的范式进行内容编排，另一方面对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回应与思考，从而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

首先在文本书写上，《孔门理财学》按照西方经济学说主流的生产、消费等学术书写范式进行内容编排。陈焕章最初试图从《大学》的“生财有大道”一节中寻找理财学的分部，却感觉缺少了分配这一部分。然而，通过美国葛勒克（Clark）教授的讲义，他恍然发现这一讲义与《大学》的观点暗合。葛勒克认为分配实际上是生产的一部分，生产与消费构成了理财学的两大部分，即“生之为之，皆属生产；食之用之，皆属消费。”这展示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生财有大道”观念的结合。陈焕章对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读，强调了生产的目的在于消费，而消费的众寡、疾舒又与生产的众寡、疾舒相互影响。^②这说明陈焕章不仅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范式，还试图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智慧相结合，展示了一种跨文化、跨时代的学术视野和创新精神。

^①Keynes J M. Book Review of H.C. Chen 'The Economic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Economic Journal, 1912, 107(27): 584-588.

^②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萃报》1912年第1期，第78-84页。

其次在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对话与回应上,《孔门理财学》对西方财政学理论进行了本土的检验。例如在阐述自由放任主义时,该著作指出中国古代的“善因论”实际上早已生成,为现代自由放任主义提供了中国证据。同样,在政府干预方面,中国古代的均输平准等法早已在实践中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引导。《孔门理财学》还从《论语》中挖掘了对斯密“经济人的正当性”中国证据,如《论语·里仁》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展现了经济行为在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均衡。通过中西观照,该著实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智慧之间的融合,既丰富了西方理论的内涵和深度,又赋予了其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色彩,同时还展现了中国古人超前的智慧。

第三是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思考。《孔门理财学》反思了西方理论,并根据中国本土的智慧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如《孔门理财学》发现,无论是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自由竞争能产生激励,但人的自利性追求会导致生产与需求的结构失衡,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介入,但是政府的干预措施是一种外生力量的“硬”调节,并不能较好的解决自由放任引发的危机。《孔门理财学》用大量的中国历史事实论证了政府的“失灵”,如王莽改制的五均制、王安石的青苗法等最后都不可避免走向失败。进而提出了解决市场与政府“双失灵”方法,就是第三只手——道德。《孔门理财学》认为可以用儒家的“礼义”之道实现自由放任与宏观调控的协调,“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孔门理财学》中所描述的儒家“礼义”其实就是现在经济学中常言的“第三只手”,其核心是融利于义,所谓“义,利也。”(《墨子·经上》),即国家财政活动,在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之外,还应塑德,找到了“市场的手”和“政府的手”之外的第三只手——“道德”。

(三) 学科研究的方法工具

方法论作为一种对学科研究过程和逻辑结构的推理规范,确立了研究对象的工具属性,界定了问题的解决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准确方法,为学科话语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操作指引。中国古代财政学多采用历史叙述和案例分析的方式,而近代西方财政学则更倾向于使用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这一点体现了两者在研究工具和技术上的不同,即古代中国财政学更多地依赖于文献和经验,而近代西方财政学则更多地依赖于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

近代中国财政学逐步接受了西方的逻辑推理和演绎方法,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学术界对于理论一般性和系统性的重视,还标志着财政学研究从描述性研究走向了更加理论性和系统性的探究。以朱通九为例,他不仅精通西方财政学的基础理论,还能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分类总结、统计法等,对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为财政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法指引(王昉,2009)。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一些认识世界的方法工具并没有得到重视,如哲学方法论、历史学方法论等,这在学科构建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导致了“范式依赖”,即过度依赖西方或其他外来的理论和方法,而忽视或排斥本土的知识和智慧。这种范式依赖会削弱学科的本土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使其在全球学术领域中处于边缘或附属地位。其次,对本土方法论的忽视也会影响学科的文化遗产,使其失去在本土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根基,从而影响本土非正式约束的适用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孔门理财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颇具创造。首先,该著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例如在阐释人类起源之时,指出“元气”为万物之源,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象曰》),即“元气”是统御整个宇宙的核心力量,因此人类也起源于“元气”,这种解释将人类从超自然的力量中解脱出来。《孔门理财学》进一步指出,“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谷梁传·庄公三年》),即父亲、母亲和天地之气给予了人类生命,进而指出了“理财是人类进化之母”。在此基础上,《孔门理财学》认为,宇宙的结合剂被称作上帝或元,社会的结合剂被称作仁,即人类的财政活动应当符合基本的“仁义”,这也是宇宙与自然的基本规律。其次,该著采用了**历史研究法**。

《孔门理财学》通篇论述了中国古人的理财智慧，通过对孔子及管子、老子、墨子、商鞅、荀子、桑弘羊、王安石等人的经济实践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规律。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参考和深入解读，陈焕章以一名“采矿者”的角色，将儒家文献中的“宝藏”提炼并奉献给“世界消费”，为人类知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第三，是中西对比研究法的采用。**

《孔门理财学》采用了对比研究法，对比了中西财政思想的异同，揭示了东西在理财学说上的一致性。陈焕章试图证明儒教思想与现代价值观念并不矛盾，从而强调儒家在应对现实方面仍具有活力和适用性。他运用了对义利观和四民观的重新阐释，试图构建符合时代化精神的经济伦理。同时通过运用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解释儒家的理财学说，并将其与西方经济学说进行细致比较。除此之外，《孔门理财学》还大量运用了归纳法、演绎法，还综合采取了宗教学、神学、伦理学等多种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力图开辟一条连接古今、汇通东西的学术道路。

四、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构建探索的反思与启示

（一）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的反思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近代中国财政学逐步接受了西方的财政学理，财政学科逐步建立，相关论著逐渐增加，学科生产力显著提高。然而，一大批财政学论著，缺乏创新力，仅限于国内流播与运用，缺乏国际传播力与应用力。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大量的财政学研究倾向于直接复制西方的理论框架，缺乏与本土实际情况的深度对话，以及对现有理论的创造性回应和反思，难以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另一方面，尽管有些财政学研究试图挖掘传统的理财智慧，但它们大多停留在对传统理财智慧的机械式还原上，未能深入到学理解释的层次，其研究方法和观点缺乏对传统财政观念与现代经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洞察，限制了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贡献。而这两点都归因于一个重要原因，即近代中国深受千年皇权统治下的小农经济体制影响，无法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中西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难以进行深度交流，也就导致近代中国学术难以与国际主流学术进行对话与接轨。所以近代财政学多数论著未能实现对本土智慧与西方学理的有机融合与深度提炼，从而导致了在理论构建上的单一化倾向，而且也限缩了财政学科构建的理论深度，使其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受限。

当然，《孔门理财学》的出现为近代中国财政学科的话语权取得了一席之地。《孔门理财学》之所以产生话语权，**其关键的生成路径是在民族智慧挖掘的基础上总结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1912年，陈焕章发表《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一文，指出“盖西人每多鄙夷中国，几以为世界之文明，惟西方专有之，而中国未从占一席也。”此种现象固然是由多种因素造成，但其中一个学术上的因素是，“我们中国人向来喜欢以西学附会中学，动辄谓西人窃取吾说，此不值一笑者也。或望文生义，喧宾夺主，剿袭西人之绪言，为中文之解释，而于本文正义，反乏发挥”。^①陈焕章认识到中国的学术多取径西方，而对本土的智慧，多有附会之意，对国粹妄自菲薄，使国人缺乏本土理论，在世界学术中缺乏应有的地位与话语。为昌明中国文化，陈焕章深入挖掘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王安石等的理财思想，并用西方经济学术语体系将其贯穿，从而形成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国外对该书的关注，不仅在于该书构建的理论体系，还在于西方对中国古人的智慧的关注。英国学者布洛克评价（1912）说，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对经济的调控措施较为引人入胜。^②经济学家罗斯（1912）评价说，

^①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萃报》1912年第1期，第78-84页。

^②参见 Bullock T L. Review of books: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12, 107(27): 531-532.

孔子及其后人的经济思想，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①凯恩斯（1912）认为，书中的大量信息，例如孔子的优生学原理、劳动力流动原理或中国税收制度的历史，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②

《孔门理财学》话语权生成的另一逻辑路径是融汇了中西学说。陈焕章具有得天独厚的中西学术背景。在13岁之时，陈焕章即拜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大儒，在康有为的耳濡目染下，陈焕章熟悉了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并在其年少之时即确立了“尊孔崇儒，数尼山教义，振民族精神之志”的理想。陈焕章在24岁高中进士后，以翰林身份奉派为留美人员，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经济学，师从著名财政学教授塞利格曼。独特的求学经历，使陈焕章学贯中西。他不仅熟知英文经济学文献，还精通中国经典文献，也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其能得心应手的融汇中西学说为一炉。《孔门理财学》即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阐述了中国古代的理财智慧。施格评价说，“由于陈焕章能对英文文献广泛了解，使得他能在中西文明之间进行若干有趣的比较”。^③布洛克（1912）评价说，《孔门理财学》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④

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只出现了一本《孔门理财学》，大部分财政学论著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或照搬西方学理，借用其分析工具和理论体系，未能实现对西方理论体系的批判性吸收与本土性回应；或是机械地概述本土经验，以一种描绘性的方式回溯历史，陷入一种简化归纳的窠臼，导致近代中国未能从中提炼出具有理论推动力的观点和见解。《孔门理财学》出版不久，中国政界与思想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使中西文化出现人为性对立，在全盘细化的影响下，产生本土文化自卑化与西方文化的“外慕”化的二元并立之局（傅静和董家丽，2003），进而导致传统文化的挖掘逐渐被边缘化，使《孔门理财学》等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探索的连续性研究的骤然缺失，从而导致这一有效路径的探索由此中断，未能向西方一样形成连续性、持续性、深化性的进一步学术探索，这种学术断层也是导致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近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的启示

应当而言，当代中国正在努力探索财政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并取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同时，学科的生产力不断提升，一大批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学科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一些研究成果刊发于国际权威刊物上，并被广泛引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遗憾的是，中国财政学界尽管近年来理论创造丰富，但原创性能力较弱，也并未能探索建立一个既能涵盖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又能融合中国话语和体现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正如习近平（2016）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中国财政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引领力、传播力和应用力都十分薄弱，尚缺话语权。

当代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的缺乏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本土财政智慧的挖掘依然处于边缘化。**目前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对本土智慧挖掘成果十分稀少。学术期刊的发文趋向

^①参见 Ross E A. Reviewed Work(s):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12, 27(4): 883-884.

^②参见 Keynes J M. Book Review of H.C. Chen 'The Economic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Economic Journal, 1912, 22(88): 584-588.

^③亨利·施格（Henry Seager）：《理财学教授施格先生序》，1911年10月25日。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页。

^④参见 Bullock T L. Review of books :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12, 107(27): 531-532.

与学者的研究取向对本土智慧，尤其是历史传统的关注并不多。同时，对中国当代财政治理的制度实践研究也不多见，即使有一些成果关注到了中国当代财政治理的宏大叙事，但是又不可避免地要从西方学理中去寻找“中国之治”的生成逻辑，对本土智慧的挖掘与提炼依然得不到重视，中国传统理财智慧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现象长期存在，使中国财政学界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过程中，忽视了本土经验与智慧的价值。**第二，对西方理论的过度“青睐”。**当前中国主流财政学的研究范式中，西方的市场失灵理论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一理论框架的主导性不仅塑造了学科内的主要研究方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学者们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选择。围绕市场失灵这一核心命题的研究虽然在解释某些特定现象和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同样也揭示了一种理论倾向的单一化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削弱对复杂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解释能力，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学者也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尝试脱离“市场失灵”的理论局限，但是其构建的新理论还没有完全走出从西方理论中寻找中国财政治理的理论依据并指导实践的困境（马金华和毕学进，2023）。这一现象导致了**中国财政学研究在理论上对西方过度依附**，也就难以形成从中国智慧中生成原创性的理论成果。第三，**方法论的严重单一化。**社会科学拥有多种研究方法，当前中国财政学科的研究方法论，多数青睐多个变量之间的计量研究。数学模型作为一种必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在许多领域具有工具性功能，对于解释一些财政现象亦有裨益。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当前中国财政学科的研究过度推崇计量模型，着眼于实践中多组变量关系的探讨，试图通过统计和计量手段捕捉和描述这些关系的结构和动态特性，却往往忽视深层次结构和动态机制的分析，也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复杂影响。另外与西方相比，中国财政学的计量模型多数是研究实践变量的因果关系，很少有学者能利用数学模型推导出适用于全人类的财政治理一般性规律，且不具备方法论上的原创性，导致中国财政学科难以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实际上，一些蜚声全球的著名财政学论著与财政学人，多数采取了综合性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科学基础的归纳法、演绎法，并交叉使用历史研究法梳理长时段的演变规律，进而生成了人类一般性行为规律的重大理论成果，这值得引起我们深思。

回顾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的探索过程，为当前中国财政学科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首先，挖掘本土文化，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向世界传递中国智慧。习近平（2016）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西方学者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主要是从本国生产、实践、文化与意识形态出发，凝成了一套解释全人类发展规律的精密的学术话语生产和运作机制（赵春丽，2020）。而中国当前的财政学构建，还缺乏对民族智慧的挖掘。陈焕章之所以能著成《孔门理财学》，是基于其厚重的中西学科知识，使东西学术得以嵌合，生成了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准则。反观中国当前财政学理论探索，挖掘民族智慧的理论性研究依然寥寥可数。习近平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习近平，2022），中华民族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学说，未来中国财政学界需重视对这些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与智慧的挖掘，用国际通行的规范学术语言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层内核元素（程霖和夏艳秋，2022），同时深入研究阐释中华理财智慧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传递中国之声。另外，中国当代财政治理的实践，不是西方财政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对中国历史理财智慧的时代性转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调适、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融合而形成的独特治理体系（马金华和毕学进，2023）。总结中国之治，提炼中国之智，讲好中国故事，在中国当代宏大治理的叙事体系体系下，建立一个既能解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的财政治理实践，又能涵盖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财政理论体系，以提升中国财政理论话语权。

其次，借鉴西方理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与学术融合。虽然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典籍与智慧，但是这些观察和智慧往往是片断性经验总结，缺乏相互连接的框架和结构，未能抽象化到一般性理论。《孔门理财学》成功的关键之处，是兼容中西，以近代西方经济学原理、进化论等学说，诠释中国古代经典，促进了中西学术的融合。《孔门理财学》没有盲目排外，而是“洋为中用”，使中国思想焕发了新的生机。西方近百年来，形成了系统性的财政理论体系，为西方国家的财政改革提供了学术上的参考。当前我们可以通过运用西方财政学研究范式，通过结构分析和语义建构，揭示中国古代文本背后的隐含逻辑和思维模式，将中国传统财政智慧的精髓提炼出来，转化为现代财政学的语言文本和理论结构，并将这些提炼后的理论成果与国际主流学术进行对话，以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并将中国智慧转化为一种能够为现代社会和全球问题提供见解和解决方案的人类共用知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还需要注重本土文化及价值的兼容性问题。未来一个可能的方向是，以从古至今的历史溯源，由中及外的理论挖掘，将西方的财政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让本土智慧逐步接轨世界，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最后，综合利用科学性的方法论，为学科话语的构建提供方法指引。科学的方法论为学人在理论研究中提供了工具导向。当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日新月异，一方面中国财政学科需要利用计量工具探究一些实践变量中的关系，为政府财政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参考。同时可进一步利用数学模型，推导出适用于全人类的财政治理一般性规律，以突破计量模型单一变量回归的工具局限。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如归纳法、演绎法、实验法、调查法、历史研究法等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历史研究法，能够连接古今的学术对话，为现实理论提供了检验的素材，同时也为人类财政活动长时段的规律演变提供了研究样本。斯密、马克思、凯恩斯、诺思、陈焕章等人的研究方法即大量采取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历史的解读揭示了人类进化与社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与西方国家文明典型的断裂性特征相比，中华文明具有历史连续性，因而一些西方知名著作多引用中国历史，如斯密大量用中国的古代的劳动分工、市场交易与国际分工论证自己的观点。中国立于五千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宝藏”上而弃之不用，而取径西方的计量工具，实乃本末倒置。中国财政治理与西方的方法论存在本质不同（毕学进和马金华，2022），中国财政学科要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归纳、演绎分析中国历史制度变迁必不可少，通过对历史的解读，揭示实证分析难以捕捉的历史周期性规律，提炼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交织下的财政治理变迁，并将中国财政历史与其他文明和国家的财政历史进行对比，发现其中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普遍适用的财政治理原则，以增强中国财政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五、结 论

本文的结论是，在近代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尽管未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但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为中国财政学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有限但重要的话语权。然而，这种话语权因其数量有限性，未能实现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在“全面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国人并未沿着《孔门理财学》的研究路径，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进而使中国智慧凝成人类一般规律性的理论框架，使《孔门理财学》的话语权也仅是昙花一现。在学术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中国财政学已经逐步步入国际化轨道，表现出与全球财政学范式的同构性。然而，尽管学科体系趋于一致，由于缺乏像《孔门理财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代表作，其国际财政学领域的话语权仍显不足，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前中国财政学依然

是在“西方知识”下成长起来的，中华文化与本土智慧的财政学挖掘依然处于碎片化、边缘化。通过《孔门理财学》可以发现，中国古人拥有超前的预见性和较强的普适性智慧。借鉴国际通行的理论范式，或可以将本土的理财智慧转变为一套解释全人类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国本土并不缺乏智慧，而是缺乏能将本土智慧转换成人类一般价值规律的方法。**

近代中国财政学话语权的构建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如下经验和启示。首先，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中，挖掘本土智慧不仅是对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也是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构建。这一过程涉及到文化符号、文化语境以及文化叙事的多维解读和重构。未来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可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财政理念、制度与实践，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框架，以注入中国财政学本土文化内涵，赋予其中国底色。其次，中国财政学话语权构建要合理借鉴西方财政学理，这不仅要求对西方财政学知识体系进行选择性地吸纳，更要与西方财政学进行本土对话。未来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可通过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解读和应用，将其转化为推动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和理论创新的有效工具，以实现“洋为中用”。第三，实现中西融合，实现中国文化元素与西方理论框架、方法工具的交融和互动。中国尽管历史资源丰富，但是并未像西方一样形成逻辑严密、方法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未来中国财政学的研究，可借助全球通行的学术语言，对中国古代财政思想进行结构分析和语义建构，将中国文化隐含逻辑和思维模式转化为现代财政学的语义文本与理论结构，进而将中国智慧转化为人类共用知识，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毕学进, 马金华. 中国式现代化的财政治理方法论——基于全球史视野的对比考察[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2, (6): 4-14.
- [2] 毕学进. 晚清财政理论的西学东渐——基于文献综述的分析[J]. 地方财政研究, 2021, (4): 101-112.
- [3] 陈焕章. 孔门理财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4] 陈龙. 国家治理“3+1”架构下的财政能力集——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分析[J]. 财政研究, 2020, (11): 21-32.
- [5] 陈先红. 返回中国性: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新文科建设路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2): 48-55.
- [6] 程霖, 夏艳秋.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初心与未来使命[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2, (4): 14-31.
- [7] 傅静, 董家丽. “打倒孔家店”之历史反思[J]. 理论学刊, 2003, (5): 130-133.
- [8] 高培勇.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12): 102-122.
- [9] 郭小兵. 民国《财政评论》(1939-1948)研究[D]. 武汉大学, 2015.
- [10] 胡寄窗.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11] 姜敏, 郝煜洋. 论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 缺失、原因和对策[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9): 1-15.
- [12] 李俊生, 姚东旻. 财政学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基础? ——兼评市场失灵理论的“失灵”[J]. 经济研究, 2018, (9): 20-36.
- [13] 刘尚希, 李成威, 杨德威. 财政与国家治理: 基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逻辑[J]. 财政研究, 2018, (1): 10-19.
- [14] 刘晓路, 郭庆旺. 国家视角下的新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变迁[J]. 财政研究, 2017, (4): 27-37.
- [15] 马金华, 毕学进.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基于古今中外财政智慧的创造性转化[J]. 财政研究, 2023, (3): 17-31.

- [16] 马海涛, 陈珊珊. 新市场财政学: 批判、继承与开拓[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7, (3): 5-15.
- [17] 吕冰洋. “国家治理财政论”: 从公共物品到公共秩序[J]. 财贸经济, 2018, (6): 14-29.
- [18] 吕炜, 靳继东. 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中国财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建设的再认识[J]. 财贸经济, 2019, (2): 5-19.
- [19] 谭伟平. 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学形态[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 [20] 王昉. 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110-117.
- [21] 王宏亮. 从学科史到理论建构: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实现路径[J]. 社会科学论坛, 2016, (8): 81-88.
- [22] 韦路, 秦林瑜. 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现状、问题与提升路径[J]. 新闻与写作, 2023, (3): 34-45.
- [23]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2).
- [24] 习近平.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 求是, 2022, (14): 4-8.
- [25] 赵春丽. 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建构路径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 (1): 146-156.
- [26] 赵蓉英, 常茹茹, 朱伟杰, 等. 学者学术话语权形成机理与评价框架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 1-8.
- [27] 郑娟榕. 把握中国理论学术话语权的关键点[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 122-128.
- [28] 邹进文. 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 [29]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30] (奥)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1卷)[M]. 朱泐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31] (德) 马克斯·韦伯.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 儒教与道教[M]. 王容芬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 [32] Wang W, Liu J.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Overseas: An Application i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J]. Creative Education, 2022, 13(8): 2500-2514.
- [33] Storper M, Dunning J H.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Flows[M]. Globalization, Regions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n Finance in Modern China

Summary: Fiscal policy, crucial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cademic interest, particularly regarding its appl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cholars have endeavored to interpret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fiscal policy facilitates governance and imparts wisdom, employing divers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Nonetheless, it is somewhat regrettable that scant attention has been directed towards the issue of discourse power within the fiscal discipline of China. This oversight not only risks relegating national governance to a subordinate position under the dominant Western fiscal theories but, more crucially, imped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utonomous discourse power, thereby constraining the effective articulation of China's position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addre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within the field of fiscal studies in modern China, delving into the exploratory effor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in

this domain. The study uncovers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publication of a significant body of fiscal literature leading to an apparent augmentation in the discipline's productivity, the innov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se works remain comparatively limited. "The Economic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authored by Chen Huanzhang, strives to surmount these limitations. Grounded in the classical doctrines of Confucianism and articulated through the analytical methods and terminologies of Western economics, the work employs an integrativ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hat encompasses induction, deduction,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modern fiscal studies o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t probes into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scrutiniz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governing state activities, and identifies universal behavioral norms.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pplicable across the dimensions of humanity, state, and individual, i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figures such as Keynes, with certain elements even finding resonance and ado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wcasing significant innovative, disseminative, and applicative strength. This illu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to contribute to a global doctrinal synthesis, suggesting that future research in China's fiscal discipline should intensively mine indigenous wisdom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and academic traditions. The aim is to develop a fiscal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explicates and guides the unique fiscal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China but also encompasses the universal laws of human society, thereby offering Chinese solutions to global challenges and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fiscal studies.

The paper's significance lies in addressing the underexplored aspect of discourse power in Chinese fiscal studie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 uniqu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China's traditional insights with international fiscal practices. By doing so, it aims to elevate China's fiscal discourse power on the world stage, underscoring the necessity of valu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alongside glob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Discourse power; "The Economic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Confucianism; fiscal studies